圣保罗医院的创办和变迁

陆肇刚　　陈登瀛

一、英国基督教圣公会在开封创办医院

天津条约后，帝国主义各国派传教士深入我国内地设立教堂，办学校、开医院、为其文化侵略服务。英国基督教圣公会先后在一些省份设立传教区。清朝末年，中华圣公会各教区会督（主教）在上海开会决定：由加拿大（英属地）圣公会为差会，在河南省开辟传教区。加拿大圣公会牧师怀履光（WiLiam、CharLeS、Whita）带领福建教区传教士四人来河南，在开封南关建立传教基地，设中华圣公会河南教区。1912年在该处创办开封圣公会医院。1913年正式建院，定名为圣保罗医院。由英国籍女大夫雷××任院长。另有福建人陈雅各大夫和护士，学员数人。（民国二年三月六日《时事豫报》曾刊以通讯）。

二、教派发生矛盾，圣保罗医院迁商丘改名

因医院与英国基督教内地会开设的福音医院毗邻，两院相互矛盾，经英国驻汉口领事馆裁决：鉴于福音医院开办在先，圣保罗医院外迁。中华圣公会河南教区会督于1915年将圣保罗医院迁商丘县，暂用城内西马道街圣公会教主堂房舍开诊，称“三一”医院。当时有加籍大夫胡××和陈雅各大夫，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学员谢××、××××。后又由加拿大圣公会派来女大夫曹慨瑞（PLtreVit）、护士贝美瑞（RULy、peteLS）来院。由于本地居民对西医缺乏认识，来看病者甚少，医院采取信教者免费诊疗，平民看病减免医疗费以拉扰吸引病人，借医传教。

三、医院另建，院名复称圣保罗

1917年，圣公会在商丘县城北平顶堌堆集马楼庄南买地四十八亩二分零五毫四忽，价白银一千四百九十四两三钱六分八厘为医院开建新址。约一年建好平房四座，医院即由城内迁来开诊，仍称圣保罗医院。由曹慨瑞大夫任院长。（《嵩岳日报》于民国六年三月十五日报导此消息）又请来美籍安佩清大夫（美国基督教信义会人员）协助，继续建门诊和病房，于1920年先后建成。门诊楼为两层砖木结构，下层为男、女门诊、候诊厅（兼作礼拜堂）上层为男职员宿舍。病房楼为小工字形，砖木结构，中体三层，下层为公事房及部分医疗用房，上两层为女职员宿舍，两端为单层大病房，中有走廊房间相接，有地下室。门诊、病房均为白铁屋顶，仿宫殿式飞檐挑角，颇壮观。建筑面积2605平方米。当年挂出圣保罗医院匾额。有职员、工人20余人，病床四十张，分男女两个病房，另有割症房（手术室）、接产房、婴儿室、药房、实验室。有显微镜两架，救护车一辆，由贝美瑞任护士长、有中国男女护士4至5人。护士还兼管药房。化验工作由医护人员兼作。初时住院病人不多，床位经常空闲。

四、首创院办护校，继续购地扩建医院

1921年医院因病房护理工作需要，创办归德圣保罗医

院护士学校，贝美端任校长。第一班招收男学员三名，女学员一名共四名，在病房担任一定的护理任务（该护士学校第一班于1925年毕业，同年招收第二班学员，1927年1929年两度仃办，1931年后根据国民政府规定，向教育部和中华护士学会备案，由我国护士李德福任校长，定名为商丘圣保罗医院附设高级护士职业学校，学制四年）。

1923年至1924年先后购入院外毗邻土地共31亩半分3厘8毫4丝1忽扩建医院。1925年在医院对面建筑保安宿舍一所，平房30间和简易小房数间，供远道就诊病人住宿，按天收住宿费。

1922年至1926年间，先后在医院内北部为加籍医护人员建西式住宿楼房三座，均有地下室，地面上两层，每座建筑面积450平方米，造价5500——6000块银元。内有客厅、书房、饭厅、卧室、洗澡间、厕所、贮藏室、凉台、壁炉，供一人或一家（多为2——3人）使用。楼外各有草坪、花卉、树木。南侧有花墙与医疗区隔离。

1924年加籍大夫绕××来院，在院二年余，因小孩生病回国。同年中国大夫张惠庭来院。

1925年“五卅惨案”后，反帝运动影响商丘，医院工人到商丘县参加反帝大会。加籍医护人员离开医院，由张惠庭大夫担任院长。同年齐鲁医学院毕业生徐淑眉来院，一年后加籍医护人员返院，曹慨瑞仍任院长，张惠庭任副院长。由张惠庭、徐淑眉分管男女病房。

1928年加籍大夫郭海伯(Dr.H.H.Gibgert)来院，郭擅长妇产科。一年后加籍大夫包志德(Dr.RiChard.BrOWn)来院，包大夫擅长眼科。

1927年至1930年间，商丘处于直奉军阀和蒋，冯混战地带，伤兵及民众的枪炮伤甚多，有时住满病房，此期护士学校男护生多人离校到国民党军队充当医官。

1930年郭海伯大夫先后购入发电机两部，锅驼机两部，建发电房。郭海伯亲自开机发电，供医疗照明使用，为商丘首家用电。郭又设计无影手术灯一俱，由医院白铁工人李明善制作。用于手术照明，效果良好，至今仍在使用。还购进德制150毫安X光机一部，开始X线透视和摄片诊断。并将病房两端大病房接建为两层共432.8平方米，增加床位40张。1932年至1933年郭为教会总干事兼医院总务主任，并为中国院长建住宿小楼两座，每座169平方米。

1934年曹慨瑞院长回国，张惠庭副院长辞职，郭海伯任院长。此期加籍护士康爱莲（Miss.S.S.kelsey），翟××、铁××，聂××先后来院，在院工作时间长短不一。中国医生和护士5至6人来院任职。

1931年至1940年总床位已达80张，职员、工人、护校学生共计70余人，并有外地教会医院外籍医生数人来院短期工作。此期病人逐渐增多，日门诊量70人次至80人次，初诊由医生诊断治疗，复诊一般多由高年资护士处理，以常见病地方病为主。每周二、五上午为手术日，可作膀胱切开取石，兰尾摘除、截肢、偏桃体摘除，外眼手术、卵巢瘤摘除。逐步成为豫东边缘地区设备较为完善、在民众中有一定声誉的医院。1936年建20立方米自来水塔一座、将原各楼小水柜手压提水改为统一供水。

五、医院、学校、农场三结合扩大教会影响

在建医院的同时，教会先后在医院两邻购地，开办学校一所，初为马可小学，后改为豫东中学。购地126亩，开办农场一所，使传教、教育、农政相结合。采取发放赈济，教友医疗费减免，子弟减免学费以及学校贯输等手段，拉拢麻痹民众扩大影响。1926年建发电房一座，拟供医院、学校、农场三处用电，但未办成。

1935年建专用礼拜堂一座，名圣爱堂，设董事会，由商丘城内教会牧师、医院专职传教人员、高级职员任董事决定传教事宜。每礼拜日由城内教会牧师来院领导礼拜，凡医院职员必须参加。专职传教人员不定时向病人布道（传道）。

六、外国医护人员的特权与医院等级制

医院加籍医护人员为差会派遣人员，来院前先在北平学习官话一年。在院负有监督权力，领取高额薪金，每5年回国休假一年。每年夏秋季到北戴河、青岛、鸡公山避署至少两个月，群众谓之“歇伏”。在院住单楼房一座，有大师傅、二师傅、勤杂工、洗衣工等侍候其日常生活，享有特权。

医院院长由中华圣公会河南教区会督任命，职员工人由院长聘请雇用，不录用已婚女护士。每年十一月份对职员下次年聘书，届时如不续订即作解聘论。人员之间等级明显，院长住小楼，高级职员住独院，工人给担吃用水，子弟上学有学费补贴，职员宿舍有工人送开水，打扫卫生。工人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住一般楼下排房或院外工人宿舍，附近村庄工人不安排宿舍。院规严格，加籍人员的“指示”必需服从，稍有违背即受到申斥、处罚、甚至解雇。

建院初期，基建设备经费由加拿大差会供给（加拿大多伦多城：圣保罗教堂先捐款一万加元为建筑费，圣保罗医院名称由此而得），以后日常开支靠医疗收入。病房分头等二等三等，头等为单间房，二等为木隔内床位，三等为10至20张病床的大病房。收费不同饮食也按一、二、三等供应。病人住院需要有铺保，担保病人的经济和身份。治疗上签字划押，内容是：一切治疗或手术，用迷药统遵医院大夫所命，万一不幸当归天命，与医院毫无干涉，费用亦由立字人负责。

七、日军侵华、商丘沦陷与日军接管医院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占我大片国土，烧杀枪掠残害中国人民。1938年5月商丘沦陷前夕，四乡民众纷纷到医院避难。医院以万国红十字会名誉开办了一个难民所。职工组织服务队收容难民三千余人。5月28日商丘沦陷，医院因系加拿大（英属地）在华开办的机构，难民所又冠以万国红十字会名誉，当时日军没有进入医院，商丘县维持会（汉奸过渡政权）成立后，日本宪兵来院命令难民返家，医院难民所遂告解散，前后历时两个月，城乡民众感恩于医院难民所的庇护，立石碑五块纪念。

1939年郭海伯、包志德回国、徐淑眉大夫接任院长。

日本侵略军占领商丘后，商丘与抗战区的交通被封锁，蒋介石命令扒开黄河花园口造成黄泛区，西路交通受阻。商贾曾一度云集商丘县东关和朱集（现为商丘市），流动人口增

多，加之侵略军的烧杀枪掠，造成民众生活极度困难，疾病流行病人增多。1939年霍乱大流行，虽有很多患者到医院治疗，但是，因医药缺乏，多为皮下补液，死亡者甚多。

1941年12月8日，日本军派宪兵将医院封闭占据，拘留了加籍护士康爱莲，人员物资登记冻结听候处理。20日后由开封日本同仁会诊疗防疫班派来日军医员斋滕健三，看护妇、药剂师、事务员共五人，将医院改为同仁会开封诊疗防疫班归德分班，滕斋健三任分班长。交接后日本宪兵，警察撤离。1942年改为同仁会归德医院，仍由徐淑眉任院长，但实权操于日本人之手。日本医护人员仅给少数来院的日本人，高丽人患者诊治，不参与中国患者的治疗。此间日本宪兵曾三次来院大搜查，人员集中搜身，翻箱倒柜，连房顶墙壁均进行探测。下令凡有红伤（枪弹、刺刀伤）患者住院和出院时均需向宪兵队报告，借以搜捕八路军和抗战人员。平时中国人见到日本“皇军”要鞠躬行礼。医院职工多人遭呵斥漫骂，拳打脚踢备受污辱。（此期间人员分类，手术统计情况见下表。

同仁会归德医院人员分类表

年度	医员（医师）	护士长	护士	技术员	助手	事务员	雇员	工人	护生	总计	备考
1941	1	1	4	2	6	5	4	37	34	94	
1943	2（日籍1）	1	9 日籍2	2	4	7（日籍2）	4	51	31	111	
1944	〃 〃	1	〃 〃	2	6	6（日籍1）	4	52	31	113	
1945	1	1	5	2	6	5	4	52	33	119	

一九四一年割症统计表

（摘地区档案局资料）

膀胱石割症术	69例	刮子宫	11例	取外物	2例
探尿道割术	27〃	缝伤口	20〃	假肛门	1〃
扁桃体术	17〃	尿道石	9〃	截小便	5〃
漏痔疮割术	83〃	兰尾	2〃	子宫环	1〃
疝气割术	12	上石膏	4〃	包皮割术	39〃
破腹割术	8	放腹水	6〃	缝唇	5〃
取子弹〃〃	14	淋巴腺瘤子	9〃	植皮	1〃
眼科〃〃	82〃	睾丸割术	3〃	抽胸水	2〃
活动关节术	3〃	上夹板	6例		
截肢	23〃	鼻科	4〃		
刮伤口	84〃	拔牙	33〃		
取炮皮	12〃	乳腺瘤子	9〃		
小瘤子	43〃	乳突	9〃		
割口子	74〃	小瘘子	12〃	总计	744〃

一九四一年决算表

（摘自地区档案局资料）

项目	金额	项目	金额
收入		支出	356.08
普通收入	52924.78	宗教	738.65
住院费	75837.45	护士班	738.65
门诊收入	74114.60	办公	1911.04
损益	11754.75	医药	40265.06
		工薪	26628.75
		伙食	34328.46
		燃料	4066.52
		日用品	4106.09
		修理	4987.87
		机器	4105.00
		损益	8864.73
		教会总会	2198.83
		私人	9100.83
		结余	72973.67
总计	214631.58	总计	214631.58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八、抗战胜利，医院再次恢复圣保罗名称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医院职工摘去同仁会牌子，仍挂上圣保罗医院匾额，徐淑眉仍任院长。1946年加籍护士长贝美瑞、康爱莲来院参与医院管理。同年河南大学医学院派毕业生来院实习。

1947年睢杞战役后，康、贝两护士长回国。1948年春季，徐淑眉辞去院长职务离院。教会会督派何恩惠大夫来院接任院长，同来医师二人担任内、外科主任。成立了院务委员会，由院长和高级职员参加协助管理院务。该时床位86张，职工59人，护士学校学生39人，医师曾一度增至10人。医疗力量增加，业务范围也有扩大。病人增多，日门诊量120人次至130人次，可作肠梗阻、腹膜炎、宫外孕、剖腹手术，内科仍以黑热病、疟疾、回归热、伤寒、痢疾、梅毒性病、胃肠道病、结核、寄生虫病为多，黑热病每天正规治疗50人次至60人次，最多时达100多人次。

由于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入院病人除予交医药费外，还需交一定数量的小麦。医院日常收入也及时购进药品或粮食存放。职工经多次向院方交涉，工薪按小麦订立合同。

1948年秋季，商丘即将解放时，内外科主任和另5名医师先后离院，院长何恩惠也于商丘解放前夕离去，部分职员请来城内圣公会牧师河南教区常务委员王浩源主持院务。

九、商丘解放医院先后与两教会断绝关系

1948年11月6日商丘解放，医院与加拿大差会断绝关

系，但仍由中华圣公会河南教区管辖，教区会督曾友山来院亲自安排，任王浩源代院长。1949年商丘军事管制委员会、工委、人民政府、工会等上级部门先后派康静、苗泽生，尹效舜、王飞霄、吕纪文，张锐来院安定人心，讲明形势，宣传政策。

1950年3月医院成立基层工会，由王凤阁、贾发亮任正、副主席。王浩源代院长辞职，教区会督派来吴秋轩（郑州中华圣公会牧师）代院长。此时社会衡器变更，由老秤（十六两）改新秤（十四两），院方拟借机采取老秤斤数改为新秤斤数发给工资实行减薪；职工在上级工会代表的支持下，和院方谈判保护了职工利益，按折合斤数发给。

七月吴秋轩因事被政府遣送离院。职工选出工人贾发亮、总务主任高克明等七人组成民主管理委员会。管理医院，与中华圣公会断绝关系，由人民政府直接领导。

1951年5月，民主管理委员会派人随同商丘行署卫生科领导，到中南武汉参加行政区人民政府召开的接受外资津贴单位会议。七月商丘行署派李锐光来院作接收前的准备工作，九月十三日商丘行署卫生科长刘化民代表人民政府来院宣布正式接收圣保罗医院，使这所由教会统治39年的医院归属人民。这时有医务人员18人（医师3人，护士12人，医技人员3人），行管、事务、工人42人，护校学生39人，共计99人。年底经商丘行署指示将原驻在县城内的商丘专署人民医院25名医务、行管人员并入接收后的圣保罗医院，组成商丘专区人民医院。使这个老教会医院成为人民的卫生事业机构。（现商丘地区人民医院）

六年地下工作的回忆

王 飞 霄

事情已经过去50年了。当时的工作情景，虽没有什么特别惊险的镜头，但是地下工作的复杂、曲折变化，是激动人心的，斗争是相当激烈残酷的。现在回想起来，更深刻的认识到党中央和毛主席制定的争取敌伪军起义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英明正确，这是我所以能在敌伪军中埋伏六年，工作六年的力量源泉和胜利的保证。离开党的领导，那是不可思议的也根本谈不上工作。我在垂暮之年，要写这篇回忆的动机就在于此。当年我们战斗在一起的很多好同志，大都成了故人。缅怀他们，我热情地在这篇回忆里再和他们团聚、拥抱。六年的时间，工作成绩虽不太理想，但也给敌伪以沉重的打击。另方面是让孩子知道这些史实，认识到革命创业的艰难，更严格地鞭策自己为四化献身。

巧 遇

1940年2月，我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结业后，随学校到晋东南八路军总司令部分配工作。四月分配到豫皖苏边区，行到壶关、平顺之间，被国民党军特务俘虏，转送到西安劳动营。

我从西安“西北青年劳动营”逃出来，直奔黄泛区。目的是到柘诚老家再打听党在哪里，找到党好继续工作。在劳动营时曾听一个睢县人姓童的青年说过，睢县以南有新四军活动，那时有两种思想在控制着我，一是失掉了党的关系，心里十分焦灼，要急于找到党，向党说明我被俘，逃出虎口的经过，急于投入对日寇的斗争中去；二是当时思想特别紧张，怕被国民党特务追上再被捉回去。所以我一出西安东门便骑上自行车直奔赤水。到了赤水在孟广爵的朋友张××家里住了两天，乘火车到临潼，经潼关、阌底镇、洛阳最后到达周口。周口是国民党统治区的最后一个关口，到周口以后，住在张润之哥哥家里，张是运襄子学校校长，我们以前是同事。第二天，同一个烟贩一起带着张给我们准备好的国民党军队护照一道渡过了新黄河（指黄泛区）。黄泛区平地都是大水，这时已是初冬季节，黄水已不像两年前我去延安时汹涌咆哮的样子。有些地方已出现些狭长的陆地。什么庄稼都没有。间或有些旧村庄的遗址。黄茅草和光秃秃的断墙，使人感到一片荒凉。在太康东、朱口集西南不远的地方下船，这就到黄泛区东边了。往东再也没有黄水了，在朱口集客店里住了一晚，一早背上被子东行。路上的行人很少，心里庆幸没有遇上认识的人。可是走到王苞庄时，突然碰到了王风亭，王苞庄离我村只有六、七里路，我和他认识，他耕地下晌回来，正卸牲口猛抬头看见我，很惊讶地问：“你到哪里去了？”我放慢了脚步。对他说：“我送一个客人到朱口。”说完我继续走我的路。

到我们庄西，我不敢走大路，便下惠济河，幸喜有土堰可通过。过了河绕村后很快就到了家里。那天家里人都走亲

戚去了，我走到西屋关上门自己坐着。家里人回来推门看见我，都吓了一跳，我趁此机会叮嘱家里人："不要对任何人说我回来了，外人知道了会来抓我的。"

这样在家里隐藏了三天，家里人对新四军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从家里人了解到张润之还在家里，张是城北郭村岗人，离我村八里，我估计他可能知道些情况。第四天的晚上我和我幼时的伙伴王木云，一道去郭村岗找张润之，我们在润之家的西客房里会了面。他谈了些日本人、汉奸在柘城和商丘城里的罪行。特别是张映辰（张岚峰之叔）怎样勒索枪支、骡马，怎样向农民勒索和摊派。后来他谈到一个重要消息，说董路口的陈子良最近回来了，我乍听这一意外消息又惊又喜。一九三九年我在延安抗大时和子良曾见过面，同时还有张子超。他们二人是三八年底在我家看到我从延安写回家的信后去延安的。我在家信中曾告诉我父亲说："希望青年学生能来延安学习。"他和张子超是三九年初到延安的，在蟠龙大队学习。我想，他怎么回来了？真使人摸不透。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我托张润之派个人到城东董路口找陈子良，约他明天晚上在润之家会面。

第二天晚上，我同王木云一道在张润之家和子良见了面，见面后什么也没顾得上说，各人就谈起了各人怎么回到柘诚来的经历。原来他从延安随抗大一分校来到晋东南，结业后派到豫皖苏工作。在亳县县大队一段时间，后来新四军第四师政治部主任吴芝圃同志派他到柘诚县开辟工作，把永城、肖县、宿县地区和水东睢(县)、杞(县)、太(康)地区连接起来。我谈了我回豫皖苏途中的曲折情况，他非常兴奋地说："好，我们一起工作，打入张岚峰的伪军中搞敌动起义，

你先到商丘了解敌伪军情况，而后咱俩到水东特委汇报后再决定。”因子良知道我哥哥王翔九在伪军当机炮营长，王新民（我们同族）当师长，还有些伪军里的官佐是同学，所以他劲头很大。我非常兴奋，几乎跳起来“心病”烟消云散，我们就这样决定了。

由于生活中偶然的巧合，我和子良几乎是同时回到柘城在郭村岗会面，也不能说不是巧遇。这对我们在伪军开展工作是很重要的，这时我很庆幸，很容易的找到了党。

初入虎穴

从郭村岗回到家里就考虑怎样进商丘，可巧我哥王翔九派传达兵谢连生骑车来接我。我心里很纳闷，我刚到家几天，他怎么就知道我回家了呢？原来问题出在我从朱口到王苞庄遇见王风亭上，王风亭的哥哥王鸣山也在商丘，彼此都很熟识，翔九在王鸣山家里见到王风亭，风亭说此事时他还不太信呢！

刚到商丘城里我哥的家里，我哥开口就问“到家里为什么不来商丘？日寇知道了从黄泛区来可不得了！”我没有正面说明这个问题。我说“到陕西上学进了战干第四团（国民党在西安办的）在那里学习。现在毕业回来，不想在国民党哪里干事”。我哥也没有追问，其实我去延安时，他是知道的，还是他摆渡船送我过惠济河的，这样我在他家住了下来。为了出入方便他还让营部里的军需高鸿昌给我办了一个服务员的身份证，这样我在商丘就合法了，不受宪兵队、特务的麻烦，可以开始进行我的工作了。

我进行工作的方法也不麻烦，口问、耳听、脑子记就可以了。这时张岚峰司令部里各处长、科长，新成立的十六师师长及其各处长大部分是柘城人，有不少是幼年时的同学，当教员时的同事，王姓的同族。有人听说我来商丘了，就在雪苑饭庄请我吃饭，陪客也是老乡，他们都无拘无束地海阔天空地漫谈。谈者无意，听者有心。从他们的谈话里了解了张岚峰部队的不少情况。再一方面王翔九是伪军部机炮营营长，是张岚峰的红人，所以有不少伪军官和他拉关系。我在翔九家小会客室住，就经常接触那些人，有时翔九不在家，我还招待他们，从而了解了些情况。更多的情况是从翔九那里得到的，特别是伪军营以上军官的来历和背景情况。

就这样我在商丘翔九家里住了两个来月，把张岚峰部伪军的兵员、装备、防地、营以上军官的姓名、资历、人与人的关系，思想状态，训练作战特点，对日本人和八路军的态度等大概情况都基本掌握了。原来这股伪军在1939年出了事变，那时张岚峰是“剿共总司令”，他的部下第一路军司令曹大中，第二路军司令李中毅、第三路军司令宋克宾，把队伍拉到黄泛区西，投靠蒋介石去了。没有拉走的多是柘城人，张岚峰又重新编成了三个师。第十六师长王新民下辖六十一团、六十二团（新兵团，欠一个营）、六十三团。第十七师师长杨树森，下辖六十五团、六十六团、六十七团。第十八师师长潘伯豪，下辖六十九团、七十团、七十一团，军部直属有特务团，机炮营，教导团等。这时张岚峰又归汪精卫管辖，番号是“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一军”张岚峰任军长。总共不过五、六千人，号称三多，“兵没有官多、子弹没有枪多，广造枪没有土造枪多。”军官多是被蒋介石嫡系排挤下来的旧军官，

还有地主、土匪。但不容忽视的是豫东日寇驻军大力支持张岚峰重新扩编军队，再是张岚峰思想上依靠柘城县人了。因为那次事变，柘城人掌握的部队都没有“叛逃”，有的到半路上又返回来了。因而张岚峰下力重新组建军队，又培养了一批中下层军官，还用“曲线救国论”来欺骗笼络人。因此张岚峰伪军暂时有所发展。

在水东特委

1941年过了春节，我和子良就从柘城县西十五里济读池村我家出发西行。我们接上级指示规定的几个接头地点，计划行进路线，研究了应变措施。我们都穿着长袍、戴呢礼帽，衣冠楚楚。我骑辆自行车，假充是到西乡买麦秸的；子良假充是到太康买“主楼子”的。过四个十八里就到我们游击区交通站了。当时我们知道途中太康马头集驻有一个团，寨外有岗哨。这时路上的行人很少，我们心急，只觉得走得慢。我骑的那辆自行车带不动人，我们就推着车子走，内心真是着急。后来我们想了个办法，就是一人骑上车子先走一、二里路，把车子放下，仍步行向前走；后面一个人来到，骑上车子追上前面的人再往前走一、二里路，把车子放下再步行，就这样交替着骑车、步行往前赶路。走到马头集南门外，这是第二个十八里了，我们两人一块走，若无其是的谈着话，伪兵岗哨也未注意我们，顺利地通过了马头集。

我们路上一分钟也没有停，过第三个十八里潮庄集，进入了我们游击区的活动范围。但村村都是被敌伪军折腾得一片荒凉。我们走到离联络站对头张村约有三里地一个小村子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